

新中国文物保护的历史考察

(1949-1965)

姚 远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专业化的文物保护行政体系,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文物普查,建立了文物保护单位制度。中央政府颁布的一系列重要法规和政令,在国家建设中的各个历史阶段适时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促进了文物保护与国家建设的相互协调。国家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使数以千计的中华文明中最宝贵、最精华的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存。这些成就是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体现,表现了新中国在现代国家构建进程中强大的国家能力。

关键词 文物保护 历史考察 现代化

姚 远,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讲师 210023

文物是构建国民对国家认同的重要物质载体,对文物的保护是现代国家在全体国民中塑造政治凝聚力的需要。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晚清以来的历届中央政府已开始注意对文物古迹的保护。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文物保护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对文物保护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哪些成效?以往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与之相关的研究也相对较少。本文通过文献分析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对新中国前十七年文物保护历程(1949-1965)进行历史考察,厘清了一些重要史实。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专业化的文物保护行政体系,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文物普查,建立了文物保护单位制度。这些成就对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民族共同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体现。

一、中国文物行政体系的初步建立(1950-1953年)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央政府开始注意对文物古迹的保护。中央政府对于文物古迹的保护,始于清光绪十二年(1906年)政府颁布的《保存古物推广办法》。北洋政府时期,1914年袁世凯颁布《大总统禁止古物出口令》,1916年内务部颁布《保存古物暂行办法》。1928年国民政府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城市政治学视域下的城市遗产保护机制研究”(14CZZ042)和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江苏城市治理研究”(12ZZC007)的阶段性成果。

从军队政治工作看 北伐时期国共关系的决裂

李 翔

内容提要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关于政治工作的指示,成为中共党人加强在军队活动的依据。在托洛茨基等极左派的抨击下,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策略也日益左倾。在国民党牢固控制军事指挥权的背景下,政治工作与民众运动不仅未给中共带来福音,反而遭致官兵的怨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向共产党举起屠刀。鲜血反而洗清了共产党人的眼睛。痛定思痛,毛泽东得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结论。与国民党不同的是,中共的建军,突出政治工作,突出党的领导、军队的阶级性质和与底层民众的血肉联系。

关键词 斯大林 国民党 共产党 北伐时期 国共关系

李 翔,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510515

国共关系^[1],就其实质而言,焦点是大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而领导权问题,主要由军党之间主从关系的演变体现出来。决定军党主从关系的,又与国民党引入的俄式政治工作的绩效环环相扣。党代表指导下的军队政治工作,则是贯彻以党领军的主要凭依。因此,军队政治工作的发展和转变,影响着两党关系的走向与命运。从军队政治工作入手,能够清晰地推导出国共关系走向决裂的诸多缘由。

一、中共加强军事运动

1926年北伐之前,周恩来、毛泽东等人越来越感悟到军事力量的重要性。1926年2月,毛泽东在第二军军官学校讲授农民问题^[2]。他意识到,农民运动要想取得成效,必须得到军队的支持。5-7月,周恩来以广东区委军事部长身份,主持共产党员参加北伐的准备工作。周时常约集各军和黄埔军校党组

[1]国共关系起起落落近百年。无论哪一阶段,均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而大革命时期的两党关系,更是海内外学人重点关注的对象。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台北,1966年初版,1973年和1987年两次影印再版),可视为台湾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经典之作。大陆方面,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李玉贞的《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等书,资料翔实,论证严密,给人以很深的启迪。关于这一阶段的政治工作,相关的文字很多。中共对北伐时期国民党部队政治工作做出的功绩,是大陆学界论述的主要方面。

[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一段扰攘不安的岁月： 后五四时期北京的学界生态

王建伟

内容提要 五四运动之后的那几年时间对于北京而言是一段非常动荡的时期，中央政局不稳，内阁频繁更迭，各派军事势力争夺地盘的战争已经威胁到城内百姓的人身安全。政府财源逐渐枯竭，教育经费长期投入不足导致校内局势的不稳，正常的教学秩序无法维持，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均不安其位，学业正途无暇顾及，学界内部风波不断，教潮、学潮、索薪潮相互交织。同时，学界与政界纠缠不清，政治势力与教育界相互渗透，各种因素盘根错节，学界成为各方新兴政治势力全力争夺的“阵地”，学生运动的弊端日益显现，“学生”的整体形象开始呈现复杂化特征。

关键词 后五四时期 北京 学界

王建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100101

1935年，鲁迅在一篇文字中回忆1922年至1923年间的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后，“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1]。伴随《新青年》团体的“散掉”，“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2]，曾经在同一阵营内部共同奋斗的盟友，因各自立场的分歧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鲁迅的观察再次验证了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群体的内部分裂问题。同样在1935年，胡适则挖掘出了一个带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即1919年3月26日北京大学开会辞去陈独秀，“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3]。他还颇有预见性的指出，那次会议的重要性只有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段才能论定。1920年1月，陈独秀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也随之移往上海，原本建立在一个杂志上的聚合形态失去了依托阵地而逐渐松散。

更重要的是，新文化群体内部的不一致性愈发强烈，对五四运动深有研究的周策纵对此有更加具体的概括，1919年以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思想和行动上的不一致、分道扬镳甚至对面为敌，“一方

[1]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

[2]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四卷，第469页。

[3]胡适：《致汤尔和》（1935年12月2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1-282页。

论唐代江淮地区官营铸币业的兴衰

杨心珉

内容提要 江淮地区官营铸币业的兴衰轨迹与唐政府货币政策之流变切合紧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隋末时,江淮官营铸币业因战火的摧残而一度废弛,但其先天优势却得以保持,至唐初便重新起步,但规模与私铸业不能相比,其发展亦因政府两次打击私钱行动的牵连而受到限制。此后,唐王朝逐渐扭转了货币政策的思路,一方面广开鼓铸,一方面实行官私互兑制度,江淮地区官营铸币业获得大幅提振,奠定了其全国铸币业中心的地位,而这一地位却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成本的压力和货币政策的一再更改而迅速丧失,使得江淮地区官营铸币业最终在德宗朝退出历史舞台。

关键词 唐代 江淮地区 官营铸币业

杨心珉,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中国史博士研究生 210097

引言

一直以来,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唐代经济史研究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由唐王朝在漫长的经济发展洪流中所表现出的承前启后的独特时代特性所决定的。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货币常成为经济史研究者们所关注的对象,因而有关唐代货币问题的相关研究在近年来也有许多成果出现。然而,国土幅员辽阔而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是唐王朝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之一,因此在唐代,各地区在货币铸造与使用上的发展程度是不尽相同的,这是研究者们必须注意而又常常忽视的问题。客观来看,目前学界中以区域视角探究唐代货币史问题的相关研究尚为数不多,因此,本文尝试以唐代江淮地区官营铸币业的兴衰历程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对其在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考证和研究,并揭示其兴衰变化与政府货币政策转变间密不可分的重要联系,以求在唐代区域货币史研究方面取得一些经验。

一、唐代江淮地区官营铸币业发展的条件与背景

江淮地区,泛指我国淮河以南及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广阔地区,在唐代行政区划中主要属淮南道及江南道治下,有着发达的铜冶业基础。唐宋时期尚在开采的江淮铜冶矿脉中一大部分是自魏晋时就已

本文系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唐代货币史研究”(CXZZ13_0383)研究成果。

从《左传》“族大宠多”的注解 看历史解读的注释学意义

刘晓东

内容提要 注释文献,既需要文字训诂,也需要历史解读。作为研究个案,《左传》中“族大宠多”的误读,根本原因在于未将词语训诂置身于当时的历史场景,没有正确解读当时的历史。历史解读不仅有助于厘清文献的语词含义,更有助于揭示文献的深层内涵。全面深入的历史解读具有很重要的注释学意义。

关键词 注释学 族大宠多 历史解读

刘晓东,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 710119

清代学者杭世骏曾指出,“诠释之学,较古昔作者为尤难。语必溯源,一也;事必数典,二也;学必贯三才而穷七略,三也。”^[1]持类似观点的不仅限于古代学者。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在继承传统注释经验的基础上,对注释的类别与方法进行了更为细密的分类与探究,并进而提出建立专门的“注释学”的主张^[2]。回顾中国古代注释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林林总总的各种具体注释可以归结为三大门类:文字训诂、章句阐释和历史解读(即“史注”)。在儒家经学发展史上,汉、魏经学以文字训诂(“汉学”)见长,宋代经学则以义理阐释(“宋学”)而显著。在“汉学”与“宋学”长期竞逐中,同为经典注释形式的“史注”却长期被置于附庸的地位。即使作为“史注”代表的《左传》由“传”入“经”,也从未出现过“史注”引领经学风骚的盛景。在这种学术风气的笼罩下,注释者往往专注于文字训诂与章句阐释,缺乏对文献历史背景的分析解读。某些看似文从字顺的注解,实际上却是望文生义。历代关于《左传》“族大宠多”的误读就是其中一例。

一、“族大宠多”的误读

《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郑子皮授子产政。(子产)辞曰:‘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子皮曰:‘虎(子皮名)帅以听,谁敢犯之?子善相之。国无小,小能事大,国乃宽。’”以上记载的背景是:鲁襄

[1]清·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八,光緒十四年汪曾唯增修本。

[2]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关于注释之学的称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传注学”(杨燕起、高国抗等《中国历史文献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379页),另一种是“注释学”(熊笃、许廷桂《中国古典文献学》,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280页;汪耀楠《注释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本文采用后者。

日藏《全芳备祖》刻本时代考

程 杰

内容提要 日藏《全芳备祖》是宋刻还是元刻,迄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该本字体、版式与南宋建本《方輿胜览》、《事类备要》等基本一致,当出于宋末建阳同一书坊系统,是宋本无疑。避讳不严,多有简体、俗体字等现象,也见于同时《事类备要》等南宋建本,不能作为否定《全芳备祖》为宋本的依据。元大德二年(1298),方回已记及《全芳备祖》坊本。保守地说,其刊刻时间在宋理宗宝祐五年(1257)至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的四十年间,但一般不会延至元朝,最有可能在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

关键词 《全芳备祖》 陈景沂 日藏刻本 时代

程 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10097

《全芳备祖》是南宋后期编辑、印行的植物(“花果卉木”)专题大型类书,被植物学界、农学界誉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1]。其大量辑录“骚人墨客之所讽咏”^[2],尤其是宋代文学作品,因而堪称宋代文学之渊藪。所辑资料极为丰富,“北宋以后则特为赅备,而南宋尤详,多有他书不载,及其本集已佚者,皆可以资考证”^[3],是宋集辑佚、校勘的重要资源,为文献学界所重视。1982年农业出版社出版影印日藏刻本,使这一在我国久已销声匿迹的原刻在七百多年后重新与国人见面,为植物学、农学、文学、文献学界推为当时盛事。

然而日本所存刻本究竟出于何时?一般称它为宋本,而包括唐圭璋先生等不少学者都怀疑其为元本,迄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笔者近年承农业出版社之约整理《全芳备祖》,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最终我们认为,日藏《全芳备祖》刻本应属宋代无疑。兹就我们的探索和思考,与学界方家同仁分享。

一、宋刻、元刻分歧的由来

该书藏于日本,日本方面的情况不太明确。仅就民国间我国学者东瀛访书的有关记载可见,当时多认该本属于元刊。董康《书舶庸谭》卷二记载,1927年2月28日在京都帝室图书寮所见《全芳备祖》

[1]吴德铎:《〈全芳备祖〉跋》,陈景沂《全芳备祖》卷末,〔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

[2]陈景沂:《全芳备祖序》,《全芳备祖》卷首。

[3]永瑛、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全芳备祖》提要,清乾隆武英殿刻本。